

· 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

文化视阈下的社会

——基于本体论、主体体验及方法论的考察

王树生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世界经历一系列社会转型,不同的社会范畴在对社会转型进行本体性分析的同时,也隐含着文化世界对社会形态的建构与重塑。在主体体验的维度,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的融合成为个体化时代重要的生存情境,对社会生活的主观认识与意义阐释成为主体体验及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也在经历文化转向,文化在社会学解释框架中的自主性及重要地位得到认可。“社会虚化”的理论表述,反映出在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相互交融、相互建构的理论及现实语境下,当代社会及当代社会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文化时代。

关键词: 文化视阈; 社会; 本体论; 主体体验;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C9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2)05-0029-08

一、重新认识“文化”

作为产生于19世纪中叶、相对年轻的学科,社会学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与促使这门学科产生的核心议题——现代性息息相关,进入社会学视野的“文化”是现代性生发、扩展、深化与面临质疑的重要表现。在强调现代性所蕴涵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时,鲍曼指出“文化的发现以及意识到秩序的命运就掌握在人类的手中的想法将现代世界带到了一个各种形式和模式都不可遏制和加速的物力论时代。”^{[1]21} 尽管在前现代性社会及前社会学阶段,“文化”现象同样无处不在,但在现代性的框定下,“文化”包含鲜明的意蕴指向性——“文化”蕴涵着以理性与秩序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变迁及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意识的演化。

在界定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时,肖瑛指出,与作为各门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广义“社会”相比,“社会的”/Social和“社会性”/The Social范畴能

更好、更直接地表达社会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意蕴^{[2]6}。“社会的”和“社会性”范畴意味着对“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对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对人类社会的具体性和相对性、世俗性和日常性的彰显^{[2]8},它们蕴涵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维度试图化解从本质上界定“社会”及“社会学”的难题,在区分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同时,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社会学转向”^{[2]51-52}。

“社会”与“社会的”/“社会性”范畴的区分,为认识文化社会学的性质提供了启示。“文化”概念延续至今的含糊性并不意味着文化社会学失去了学科建制的合理性,而是源于文化在个体的社会存在中的整体性渗透;从本体上框定“文化”概念可能遭遇的理论困境,促使我们反思将社会世界区分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预设,“文化”作为个体社会存在的主观意识这一特殊维度与深受自然科学确定性、分析性逻辑影响的传统的社会学认知方式之间也蕴涵

收稿日期:2012-06-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范畴重释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研究”(10ASH001);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与社会转型期的大众文化”(11554099)。

作者简介:王树生(1973—),男,吉林磐石人,副教授,博士,从事社会理论与文化社会学研究。

着矛盾。对“文化视阈下的社会”论题的考察,既牵涉到对文化与其他社会学要素的关系的反思,牵涉到在以理性与秩序为主导的现代性进程中主体意识的变化,更意味着从“文化的”维度研究社会生活在普通人日常生活及学者的研究工作中得以建构、呈现与阐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结构主义、阐释人类学与象征人类学、美国的新文化社会学(参见下文)、政治史—社会史—新文化史—后社会史的方法论转换^[3],为当代文化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灵感与推动力,“文化”与身体、历史、语言等理论元素一起,为当代社会学的理论转向带来灵感,后现代社会理论更将文化作为批判现代性及现代性社会学的核心所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社会学经典问题获得了新的理论参照。

二、文化视阈下的社会:本体论、主体体验与方法论的考察视角

在思考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时,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思想十分具有启发意义。借助构型社会学的视角,埃利亚斯将个体与社会、人性与自我、投入与超脱等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本质主义探究,转换为对文明进程、现代性自我、知识社会学范式在具体的社会构型与历史构型中的动态演化。

在构型社会学启示下,本文尝试克服文化与社会之间存在稳定的、本质主义关系的思维方式,转而从社会形态的变化、主体的现代性体验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趋势这三个维度来呈现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从本体论的维度来看,当代社会不断演化,当社会学家们提出不同的社会范畴来描述与分析社会形态的变化时,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既在社会实在的层面上、也在社会建构的层面上被不断描述与生成。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与主体的现代性体验,特别是生活世界的变迁、现代性自我的生成与创伤、救赎与分裂关系密切。与社会形态的变化相对应,在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及后现代社会理论中,主体的自我结构与体验获得了不同的呈现方式,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也在不断生成断裂性。

对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的考察,还蕴涵着方法论意蕴。社会形态的转变、主体体验的变化需要借助新的方法论原则加以研究,由此,对当代社会科学文化研究方法论趋向的把握尤为重要。

三、社会转型与文化建构

(一) 社会转型与社会范畴

社会学的产生是对19世纪中叶社会变迁的描述、解释与建构。20世纪60年代(甚至是20

世纪初)以来,人类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质,社会学家们提出许多社会范畴对此进行描述。贝尔指出,人类已进入后工业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化^[4];卡斯特强调,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5];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蕴涵着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全球化进程则深化了这种现代性风险^[6];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中的政治实践既包含对风险知识的起源与扩散的反思,也包括公众对风险决策与分配的参与^[7];波德里亚通过福特社会、后福特社会与消费社会的逻辑关联,描述了消费在社会运行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的重塑;福柯、德里达等人围绕“后现代社会”这一概念批判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理论。这些社会范畴仍为考察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渗透方式、为在文化视阈下进行社会本体的重释提供了理论及现实的背景。

(二) 文化视阈下的社会本体重释

当代社会的转型为文化景观提供了新的呈现方式;形形色色的社会范畴不但描述了社会转型的不同维度及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社会角色与组织逻辑等方面的变化,也对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意义倾注过程产生影响。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职业群体、地位群体、性别群体之间的区分常常呈现为象征体系与符号世界的差异。在布尔迪厄与波德里亚的社会学理论中,表征与符号摆脱了社会还原论及社会摹写隐喻的束缚,文化参与了社会的生产:布尔迪厄描述了这个世界秩序井然、循环再生的一面,而波德里亚则呈现了一种多变、眩晕、以假乱真的景观。

布尔迪厄指出,在当代法国社会,不同群体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及权力资本上的差异被转化为以文化资本为中介的象征体系: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来源于生理差异^[8]²⁵、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子女在学习能力上存在自如与勤奋的“天赋”区别^[9]²⁵⁹、上层阶级超脱的自由品味优于下层阶级屈从本性的低俗品味^[10]⁴⁹¹……诸如此类的话语竭力掩饰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世界的现实事实上部分地是由行动者对他们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及作为其结果的世界的表征的斗争而决定的。”^[10]²⁵³尽管布尔迪厄提出通过改变社会现实的表征来改变社会现实这一解放逻辑^[11]¹²²⁻¹²³,但他并未承诺勾画具体的路线图,他提醒我们反思的问题是,一切象征颠覆运动的目标都是实施象征的破坏和建设作用,旨在推行新的认识和评价范畴,以更加彻底地摧毁谴责别人和受到谴责的群体据以产生的区分原则^[8]¹⁶⁸。

波德里亚呈现了另一种样貌。在理论发展早

期,波德里亚通过符号这一批判中介,揭示了消费逻辑服务于生产逻辑的秘密。波德里亚将人类社会的模拟分为符号对自然的模仿、商品对商品的模仿、符号间的相互模仿三个阶段^[12],而在晚近阶段,随着符号癌肿般地增生与繁衍^[13],符号完成了对现实的谋杀与替代,模拟成为比现实还要真实的超现实^[14]。在此过程中,符号的方法论意蕴逐渐让位于本体论意蕴,波德里亚也通过充满歧义、玄思与洞见的后期著作完成了由现代社会符号面相的分析者向后现代符号内爆社会的话语书写者的转化^[15]。这种转化是对社会本体变迁的判定,还是说只是一种新的批判策略?对此,可以确定的是社会世界的符号化、象征体系的横行确实使西方社会呈现出新的形态,波德里亚试图昭示在拟像驱逐真实、符号吞没现实的趋向中人类的命运,后现代社会理论正是试图借此批判与超越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化与文化社会学。

在社会转型的框定下,形形色色的社会范畴表征与建构着社会现实,“文化”在社会及社会学中的地位也得到了重新评价。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与文化“回归”绝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调整及理论要素的洗牌,而是在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相互交融的语境下,文化的生产性、建构性及表意性特质的进一步彰显,主体体验的新大陆已经浮现。

四、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交融下的主体体验

(一) 主体体验主题的变化

文化最初体现出人类实践对自然的侵蚀,然而这种将世界看做人类造物及人类能力试金石^[16]的乐观情绪并非无懈无击。在鲍曼看来,针对现代性的困境,文化被赋予新的意蕴,成为针对“转折时代”的关切与焦虑而设计的概念,有助于调和表面上不相容的对立事物:自由与必然,自愿与被迫、创造性与常规性^[17]。

这种矛盾的情愫在两个方面得到体现。一方面,自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开始,韦伯的“铁牢笼”隐喻、涂尔干的“失范”概念、滕尼斯对“社区”的怀念、齐美尔对货币化的批判、马尔库塞的“单面人”概念、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警惕,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了现代人共有的命运——异化与迷失的主题,主体的创伤成为以现代性为主轴的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另一方面,古典社会学借以为其确立合法性的实证主义预设却与主体创伤这一经典论题存在张力。在鲍曼看来,实证主义是异化社会的一种自我意识,实证主义将主体与他的异化世界的多重面向关系还原到主体的认知平台上^{[1]274、276、277}。实证主义以理性、克制、科

学、精确与可预测性为核心,在实然与应然、理性与情感、克制与欲望、客观与主观之间建立起二元对立关系,并竭力推崇前者,倾向于将后者驱逐出社会学视阈,主体的体验由此被摊薄了。鲍曼认为,对实证主义进行反击的关键不在于单纯的哲学反思与认识论批判,而在于实证主义对不含旨趣而又价值无涉的知识的偏爱^{[1]278},它放弃了对价值规范及主体体验的追问。

尽管古典思想家为认识当下提供了启示,但在当代社会中,无论是实证主义信条还是理性化阴影下“创伤”主题,都已无法完全涵盖主体体验的新内涵。

消费成为主体社会存在感的重要生成机制,“我消费故我在”,“消费再一次地成了社会劳动。”^[16]曾经被理性驱赶到历史边缘的“快感”与“欲望”在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哲学中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欲望机器^[17]。“灵魂是肉体的监狱”的名言被翻转过来,身体不再仅仅是个体被动承受权力与知识的载体^[18],而是人们主动地选择与建构自我认同的工具。来自制度、组织、职业的异化感在全球化拉扯下,被性别、种族、民族、宗教等区隔因素所促生的新的认同焦虑所强化,人格与自我的分裂成为现代人精神体验的隐喻。社会虽已世俗化,主体并未摆脱对神圣性的需求,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卢梭的政治哲学、贝拉等人的公民宗教概念启发我们去关注当代社会以纪念仪式、节日庆典、意识形态话语为载体的神圣性表征,神圣性不是简单的宗教问题,而是社会何以可能与个体何以具有意义感的关键所在,全球化格局、民族国家、社会群体间的冲突与矛盾,使个体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了重新神圣化的过程。日常生活领域出现审美化倾向,曾经被视为烦琐、平庸、低下、乏味的日常生活也通过文化意义的滋生与繁衍成为幸福所在,日常生活不再仅仅被看做对工作异化的简单逃离,而是存在价值本身。

流动的现代性、本体性安全的缺失、个体化过程……当代社会的主体面临的种种体验与古典时代截然不同,他们是两种存在差异的主体,虽沿着连续性,但断裂的色彩绝非无足轻重。物质世界与社会世界对个体的社会存在的确证效应并未消除,但主体越来越多地为精神世界而羁绊,为自我充满分裂的认同、为自我与他人的差异与区隔、为如何管理情感与身体而焦虑。人们一直试图确立的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的稳定关系松动了,怀旧主义曾为此而焦灼地找寻已逝的伊甸园,而当代社会理论、特别是后现代思潮放弃的正是对家及稳定性的承诺。

(二) 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的交融

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的相互交融成为个体化时代主体重要的生存情境。对不断更新的文化信息、社会潮流、符号体系的熟悉、掌握与操演已经成为社会化的新内容。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衍生的知识、能力与惯习都已成为自我结构的组成部分。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关系的变动,揭示了个体的社会存在越来越必须面对的挑战——因游离于或不熟悉特定的文化情境及意义系统而遭遇的社会存在的挫折感;不想落伍的个体必须紧跟潮流,熟识媒介与专家通过话语建构的并不完全存在的符号事实——时尚。

社会世界和文化世界的相互交融,还表现在个体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阐释越来越成为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希腊,关注自我包括与身体相关的健康养生、非过度锻炼、有节制的满足需要,包括自我沉思、阅读和注解书籍、对真理的回忆,包括与知己、朋友、导师或领导的交谈与通信,关注自我“不是一种独处的训练,而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实践”^{[19]389}。而中世纪基督教赎罪仪式则成为迈向现代人的关键,承担罪孽的不再仅仅是灵魂,身体成为需要惩罚与负责的对象;这种翻转与十六七世纪在军队、学校、车间出现的训练与榨取身体的技术和新的政治解剖学权力运作模式紧密相关^[20]。教会/神学、医院/医学、学校/教育学等机构/知识话语既相互共谋,也存在斗争。

福柯由坦白机制上溯至古希腊“关心自我”的机制,试图在古希腊人的自我技术与生存美学中发现突破权力与话语限制、将性经验、将人生变成艺术品的途径^{[19]191-193-194},反思与阐释自我成为这一实践的关键。面对福柯提供的启示,当代人阐释自我、他人与社会的意识及能力既可做对权力与话语效应、对异化与创伤主题的主动回应,也回应了社会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成功学书籍热销、灵修实践、心理治疗、团体拓展的盛行说明了这一点;那些面对他人及镜头侃侃而谈、剖析自我与社会、披露隐私的个体俨然成为正在浮现的“脱口秀社会”的宠儿。

“脱口秀社会”的隐喻牵涉到主体与他人、特别是与大众传媒关系的新特质。大众传媒的渗透效应已经成为萦绕个体的重要社会事实与生活本身,而不是简单的文化表征。个体沉浸在信息、符号的洪流中,一方面狂热拥抱,另一方面又渴望呈现自我。“秀”成为生活方式,人们乐意“秀”、渴求“秀”、善于“秀”。“秀”与福柯的生存美学意义上的沉重拯救既关联又存在差异,更像布尔迪厄社会学意义上的惯习——坦露性情、剖析心灵、倾诉自己、展示身体的语言与行为倾向。如果说

“异化”强调人类的造物反过来控制人类的话,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的交融则意味着现代主体越来越多地浸入社会生活的意义之网中。通过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松动、与文化世界的融合,在现代主体的社会生活中,相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人与人、人与符号的关系维度在增强。

尽管由主体参与建构的“脱口秀”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拉伯雷的“狂欢节”意味,但以符号为载体的文化世界并不是去等级化与去权威化的存在。布尔迪厄认为,女权主义者与男性争夺权利与表征的斗争策略^{[8]38}、下层阶级以上层阶级为范本对自己语言的刻意矫正^{[11]71}、工人阶级对大块吃肉及酷爱拳击的“男子汉气概”的神化^{[10]190,214-215},表面上体现出某种反抗与颠覆,实际上只是对既有分类秩序的屈服与固化。与之相比,知识分子群体通过生产与阐释文化事实促进了生活世界的意义繁衍,看似主宰着文化世界。然而,布尔迪厄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大到足以对文化资本施加权力,就这方面而言,他们具有统治性;但作家和艺术家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又是被统治者。”^[21]在法国,巴黎高师、巴黎高工等知识型学校衰落,国家行政学院及巴黎商学院等权力型学校兴起就是这一事实的一个侧面^{[9]368-369}。究其根本,掌握经济资本的大资产阶级可以凭借对权力场域的控制,主导形形色色的分类秩序,赋予自己的文化世界以合法性。

作为现代主体就意味着嵌入针对文化世界与意义体系的认知、接受、阐释的实践;没有人完全自由,也没有人完全被迫。如果说实证主义社会学试图挪用自然科学逻辑以消除现代性进程中个体的社会存在的意义不确定性,“异化”主题试图呈现个体的意义世界与主观体验的分裂感与离家感,那么,在当代社会,文化世界与意义世界已不再简单地充当逃离及反击社会世界的飞地与乐土,而是试图确立某种新的社会性存在的特质——社会世界、文化世界/意义世界已模糊了彼此之间僵化的分隔性意义,某种意义上,社会世界“文化化”的特征初步显现出来。

五、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基于方法论趋势的反思

(一) 实在论、建构论与文化社会学的方法论选择

谢立中指出,“现代主义社会学”存在以给定实在论为核心的基本预设。给定实在论认为,“事物”是先于、独立于普通认知者或研究者的主

观意识及其使用的符号系统(话语/文本/理论)、有待主观意识去认知和相应的符号系统去表述的纯粹自主的给定性实在^{[22]3-4}。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事物”不是纯粹“自然”的或“给定”的,“事物”及普通认知者与研究者对它们的感觉、意识和言说作为“符号/话语/文本性”的“实在”,是由语言符号(及相应的话语/文本/理论)建构的^{[22]12}。

现代主义社会学与后现代思潮的对立蕴涵着生活世界的社会本体论预设与社会建构论阐释的差异,也进一步涉及本体论与方法论关系的翻转。社会建构的主体既包括普通人也包括研究者,吉登斯强调的双重解释学效应由此产生:一方面是由普通人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另一方面是社会科学家用来对社会世界进行意义阐释的理论与话语;这两套意义框架之间始终存在“互渗”^{[23]522}。

在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边界互融的情况下,文化既牵涉到外在的社会世界、表征这种“现实”的符号系统,也与主体向现实灌注的主观意义密切相关——文化世界不是一个“给定”、已完成的、存在本质的“世界”,而是不断地由主体借助符号、话语甚至是理论去建构的意义世界。由此,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对社会世界的阐释成为新的文化事实,与大众的主观体验相交融、甚至成为大众主观体验新主题^{[8]38}。当社会实在论预设被社会建构论撼动后,作为社会研究阐释维度的方法论不再简单充当本体论的映射,而具有社会建构属性,方法论选择成为社会呈其所现的关键,通过建构社会现实的表征来建构甚至是遮盖社会现实。

与库恩强调“自然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相比,绝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包括社会事实、社会行为、社会批判、社会释义在内的多重范式的科学^[24]。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频繁发生的“转向”通过不同的理论及方法论革新提醒我们重新发现那些被遗忘的社会现实维度,而社会学的“文化转向”不但影响了研究与阐释社会世界的维度,也通过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的交融参与了主体生活于其中的外在世界面貌的呈现与建构。也许很难做出结论说,社会学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文化范式”,但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取向确实在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同时,加深了对文化与社会复杂关系的认识。

(二) 文化与社会:方法论反思的意蕴

1. 客观主义还原与实证主义的因果策略

可以提出“鸡肋”与“黑箱”这两种隐喻,对思考“文化在社会学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时可能遭遇的障碍进行概括。“鸡肋”隐喻暗含以下理论

倾向:在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中,“文化”是不太值得认真讨论但又不得不谈论的灰色理论地带,主要充当社会世界运行的背景要素,充当消弭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争论的调停者。而在“黑箱”隐喻中,无法用独立的、纯粹的社会要素解释的问题,都被抛入“文化”,成为建构社会学解释完备性、回避社会生活复杂机制的填充物与“黑箱”。

客观主义还原的方法论趋向与实证主义的因果策略都与以上两种理想类型存在联系。客观主义还原的方法论并不明确地否认文化在社会世界中的渗透及其重要性,而是强调文化及文化世界被归并到由“社会”要素主导的社会学解释框架中的可能性;客观主义还原的方法论常常采取迂回策略,将“文化”还原为制度、组织、政治、经济等要素决定与派生的产物,由此,“文化”概念的独立性被化约与转化了。

与还原论思维相比,实证主义的因果解释策略侧重于对“文化”与其他社会学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的考察,像处理行动、制度、组织与群体等可测量的因素一样处理“文化”。作为这种解释策略典型代表的文化生产与接受研究虽然并不否认广义的文化定义,但往往只研究体现在有形产品之中的文化^{[25]253-254},主要采用抽样、问卷、假设检验等定量化的研究方法。代表性的研究思路是选择畅销书或电视节目等文化产品,考察受众、生产技术、文化企业家、赞助人、政府政策和国家机构等因素影响文化生产的过程^{[25]263-269};也可以研究性别、种族、文化程度及职业差异对受众接受文化产品的影响。

客观主义还原与实证主义因果解释这两种方法论趋向,反映出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的张力下,文化社会学试图通过吸收与借鉴实证主义的主流研究范式确立“文化”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合法地位的理论努力。这种因果解释对文化世界的意义维度进行了暂时的悬置,或者将其转换为社会世界的外显层面,在作出理论贡献的同时,也面临质疑。

2. 意义阐释:主体的消失

涂尔干为回答“社会何以可能”提供了“文化”维度的启示,呈现出社会生活的意义维度,在许多学者的思想中都可以发现涂尔干的印迹^[26]:米德与特纳的分类与仪式研究、亚历山大对社会生活意义结构的分析、贝拉的公民宗教概念、巴特的大众文化批判、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研究……格尔兹强调,人是悬挂在由其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可以把文化看做这些网,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27]。如果把社

会生活看做意义文本、把社会实践看做意义灌注与意义建构的过程,文化研究就可以被看做意义解码与意义阐释的实践。

然而,必须牢记:一方面他人的主观意义世界是“我”无法完全进入的,这预设着主观世界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基于主体间性,他人的行动及其意义又存在为人理解的可能。尽管意义阐释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方法论预设获得了合法性,但主体的意义阐释与研究者对主体意义阐释的再阐释却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意义阐释隐藏着主体“消失”的危险。主体“消失”并不指拥有身体、承载历史、灌注意义的人在物理意义上不存在了,而是指意义阐释所引发的知识—权力关系及理论实践对主体实践的替代。意义阐释使研究者暴露在危险与诱惑中——在悬置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阐释行为存在本质差异的基础上,用前者的权威对后者的主体体验进行有意无意的替代或驱逐。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布尔迪厄对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关系的反思都描述了这种方法论陷阱^{[23][28]}。

意义阐释暗含的主体“消失”问题在文化研究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进路中引起的反应不同。人文主义进路有意无意地悬置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知识—权力关系,人文科学研究建立在主体间性使前者对后者的意义阐释成为可能且具有合法性这一预设基础上;而社会科学进路则更为关注另一方面的意蕴,即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进入他人的意义世界,即使想呈现这一世界,也要回到事物本身、回到意义世界的外显层面,实证主义的文化研究由此获得合法性。

格尔兹试图呈现丰富、深刻、复杂的意义之网,但这种以民族志为载体的意义文本究竟是巴厘人编织的,还是由格尔兹建构、属于他自己的精彩、繁复的意义世界?即使在将民族志作为研究者“成人礼”的人类学内部,民族志文本的权威性与人类学家的话语霸权也越来越受到质疑,民族志文本在文学、诗学上的虚构性及其与政治学话语权力属性的关联常常引发争议。

3. 文化自主性

史密斯指出,各种后帕森斯社会学在批评帕森斯借助规范性的、唯意志论的文化、价值理论构筑抽象稳定的社会系统的同时,常常将文化驱逐到社会学的边缘^{[29]1-2}。作为对矫枉过正的反弹^{[29]3-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美国社会学家试图借助经验性的中层研究及施特劳斯、福柯、波德里亚、布尔迪厄、威廉斯、霍尔等欧洲学者的思想将文化带回社会学,确立文化在主流社会学中的自主性。

亚历山大是最能代表美国社会学“文化”转

向的学者。亚历山大对“文化自主性”的强调与他对“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的社会学”的区分密切相关;尽管两者都使用价值、符码与话语等概念^{[30]12},仍存在深层次差异。弱范式的“文化的社会学”认为,文化的解释力来自对社会结构中的“硬”变量的研究,而被结构化的意义系统仅仅成为被真实、可感的社会力量驱使的超结构与意识形态;文化是并不独立的“软”变量,仅限于参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30]12-13}。强范式的“文化社会学”则具有以下特征:倡导脱离于社会结构的“文化自主性”,强调“文化自主性”对建立文化社会学学科的重要性;借鉴吉尔兹对社会世界意义之网进行“深描”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文本进行解释性重构;将因果性与行动者及能动性联系起来,揭示符号、象征与仪式等文化意义介入及指导社会生活的具体机制^{[30]13-14}。

周怡指出,尽管亚历山大对“文化社会学”与“文化的社会学”进行了区分,但其他研究者在应用他的理论指导经验研究时依然不能触摸到两者间的清晰边界,这种区分或许只是提供了一种理想类型,反映出亚历山大理想主义的价值倾向^{[31]210}。亚历山大强调,“文化社会学是一种社会心理分析。它的目的是将无意识提升为观念,揭示供世间男女思考的神话并让他们创造新的神话。”^{[30]4}周怡认为,亚历山大对情感尤其是集体情感支配社会世界的强调与唯心论观点非常相似,特别是当他将文化社会学等同于纯粹心智过程的分析时,亚历山大在提升文化价值的同时也缩小了文化的界限^{[31]211}。

亚历山大遭遇的质疑还与“文化自主性”的歧义性相关。“文化自主性”是何种意义上的自主?尽管亚历山大强调,“文化自主性”强调的是文化在方法论层面的分析自主性^{[30]14},但在那些深受实证主义及决定论、还原论思维影响的学者眼中,“文化自主性”包含着一种理论上的挑衅。出于对以给定实在论为基础的社会观的捍卫,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文化自主性”理解为强调“文化”及意义世界脱离社会的独立性,由此大肆挞伐。这是一种防御性解读。吊诡的是,作为理论与方法论反思产物的强范式分析,在自身展开逻辑的铺行下,常常实体化,试图揭示社会世界意义维度的“文化自主性”也常常被强范式分析者置换、转化为社会现实及社会学研究本身。强范式的文化社会学研究看似一步步地验证了给定实在论者的预言。

4. 后现代文化研究的策略

早期的社会学希望借助实证主义摒弃以内省和思辨为基础的方法论支撑,与此同时,理性与异

化的矛盾也成为社会学重要的文化母题。从表面上看,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社会学的质疑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文化的回归,但实际上,后现代思潮蕴涵着一种深层的研究策略——以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的交融为基点,通过“泛文化”宣称、话语与符号狂欢确立其理论版图,既与现代性社会学交锋,又像黑洞一样吞食现代性社会学。

后现代思潮通过冲击现代性社会学的根基——给定实在论、表现主义、相符真理论、本质主义与基础主义^{[25]3-11}来取得理论先机——通过放弃以上理论承诺,后现代思潮强调社会是由普通人及社会研究者借助符号与话语建构的,既通过话语实践建构社会现实的图像,又不断地繁衍与生产波德里亚意义上的文化现实。不断的跃迁为后现代方法论提供了理论上的主动权。当我们对后现代思潮的某些本体性论断提出质疑时,后现代文化研究通过强调社会研究的话语建构性,跃迁到方法论层面;而当我们转而关注后现代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预设时,后现代理论家的专著与观点频繁面世,质疑者、赞成者与同情者常常在批判与追随中不知不觉地将繁衍增生的后现代话语等同于社会本体。一个理论争论的循环得以完成。后现代思潮体现出理论的狡黠:争论是以当事者思想的某种确定性与稳定性为前提的,而后现代思潮却以多变性、流动性及不确定性为核心。

后现代思潮视野下的文化研究,呈现出文化游戏的某些面相。在与后现代思潮发生碰撞时,现代性社会学竭力地试图将后者转译为自己的话语体系,但这种转换恰好是后者批判的重点,断裂、差异与偶然正是后现代思潮的基本原则,由此,后现代文化研究通过反客为主的策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六、文化视阈下的社会:走在“新”的文化时代

在文化视阈下,文化世界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世界的相互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学得以确立的基点——“社会”本位,以决定论、唯实论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本体论面临质疑,文化的建构性、生产性、表征性作用成为重要的理论话题。文化世界不再仅仅充当被异化的主体固守的伊甸园,不再仅仅蕴涵怀旧情绪与对归属感、稳定感的渴求,而是成为当代主体社会性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无论是社会形态、社会结构还是社会互动,都需要援引文化的形式呈现与建构自身,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就是这种趋势的显现。

文化世界的发展使个体的社会体验方式发生

了变化,人们涉入其中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多地牵涉到意义阐释,个体对外在的物质世界、组织及制度的认知,也越来越多牵涉到主观世界及其独特体验。情感、欲望、本能等被理性及实证主义社会学忽视的概念,重新获得了重要性及现实性。现代主体不断地剖析生命与行动,通过文化世界为社会行动及社会体验赋予意义,参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

文化研究领域向来存在多种并存的研究取向,无论是还原论、决定论,还是实证主义的因果探究,都有其合理性,也都存在着反思的必要——在文化视阈下,当社会本体与主体体验发生转型时,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也在发生演变,意义阐释、文化自主性都体现出这种趋势,以文化为中介,社会似乎在“虚化”。

究其实质,“社会虚化”是对文化与社会这对范畴的关系在本体论、主体体验与方法论维度上的变化倾向的强调。在文化视阈下,作为一种隐喻,“社会的虚化”标明了某种理论反思的起点,意味着对“社会”范畴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某种警醒,意味着某种不安全感与隐忧,但它从未标定终点。然而,即使改变社会现实的表征并不必然改变社会现实,但至少有助于发现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使“社会虚化”这一观点有合理性的是以下历史及理论语境:以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社会学隐含着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的张力,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作用的理论主张影响久远;如今,这一经典理论预设面临质疑——居于我们这个时代核心的是,社会世界与文化世界、意义世界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与相互建构。必须强调,我们不再回到前现代社会,不再回到“前社会”与“前社会学”的文化世界,也不在当下僵化停滞,我们已行走在“新”的文化时代。

参考文献:

- [1][英]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M].郑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肖瑛.回到“社会的”社会学[J].社会,2006,(5).
- [3][西]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4][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高铨,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12-37.
- [5][美]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69.
- [6][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0,150,62.
- [7][德]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0-22.

- [8][法]布尔迪厄. 男性统治[M]. 刘晖,译.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2.
- [9][法]布尔迪厄. 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 杨亚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 [10]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1][法]布尔迪厄. 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M]. 褚思真,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 [12][法]波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6: 67.
- [13]BAUDRILLARD.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M]. Verso, 1993: 5.
- [14]夏光,布希亚[G]//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05.
- [15]李松花,王树生. 符号的张力:后现代性的分析中介与社会本体[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2): 95 - 96.
- [16][法]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刚,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7.
- [17]夏光. 德鲁兹和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学[J]. 国外社会科学 2007,(2)(3).
- [18][法]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 32.
- [19][法]福柯. 性经验史(增订版)[M].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20][法]福柯. 不正常的人[M]. 钱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12.
- [21][法]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包亚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5.
- [22]谢立中. 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蕴[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23][英]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4]周晓虹.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9, 34.
- [25][英]史密斯. 文化理论——导论[M]. 张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 [26][美]亚历山大. 引言: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与当今文化研究[M]//迪尔凯姆社会学:文化研究. 戴聪腾,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1 - 23.
- [27][美]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
- [28][法]布尔迪厄. 实践感[M]. 蒋梓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 [29]SMITH. The New American Cultur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G]//The New American Cultur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 [30]ALEXANDER J. C.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1]周怡. 强范式与弱范式:文化社会学的双视角——解读 J. C. 亚历山大的文化观[J]. 社会学研究 2008,(6).

Society in the Horizon of Culture

——A Research Based on Ontology,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Methodology

WANG Shu-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society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ons since 1960s. Different social categories carried out the ontological analysis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mply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remolding of social formations through cultural world. In the dimension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the fusion of social world and cultural world has been the important existent context in individualization time so the subjective recognition and meaning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lif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life practice. Meanwhile,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also undergoing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autonomy and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in the framework of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accepted. The academic expression——Emptiness of Society well reflects that under the theoretical and real context of inter-fusion and inter-construction between social world and cultural world,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sociology has already walked into a new cultural time.

Key words: the horizon of culture; society; ontology; subjective experience;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郑红翠]